

例外论视角下印度外交变奏的内生逻辑

胡 娟

摘要：宗教信仰、历史、语言、文化和地理条件等因素综合内化成了印度的例外论。例外论令印度的外交呈现道义色彩，印度又通过道义外交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标榜不结盟、非暴力、多样性、包容性和民主国家身份，把印度推崇为世界的精神和道义领袖，对西方的强权政治表现出不屑一顾。例外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印度的外交选择，印度不结盟政策的思想正源于此。印度一方面有道义外交的偏好，另一方面又是权力政治的拥趸，这看似矛盾的选择是因为印度的例外论同时具有内敛性和扩张性。在物质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印度例外论呈现内敛性，倾向于强调其道德优越性和文明独特性，通过道义外交塑造国际形象，赢得国际影响力；在印度硬实力增强的情况下，尤其是中印冲突加剧时，印度例外论表现出更明显的扩张性，倾向于选择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这是印度例外论的双重特性作用于印度外交的表现。印度在不同阶段和历史背景下都将国家的现实利益置于首要位置，在道义外交和现实主义之间，印度的例外论贯穿始终，不结盟作为其外交政策时弃时用。印度例外论的内敛性和扩张性的二元特性形成了印度对道义外交和现实主义的双重论调，是印度外交变奏的内生逻辑。

关键词：道义外交；现实主义；例外论；印度外交；不结盟

收稿日期：2024—12—20

作者简介：胡娟（1982—），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印度外交、中印关系、印度洋地区合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印度海洋外交研究”（项目编号：24AGJ015）、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面向印度洋的大通道建设”（项目编号：2023CX03）和2025年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印太战略背景下印度介入南海事务的新动向及影响研究”（项目编号：ZD202518）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关系中的例外论一般指将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区分开来的独特品质，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到特殊的历史轨迹和外交经验都能成为例外论的构成要素。有观点认为例外论必然导致道德（或精神）优越，而且是其他国家不可能复制的。^①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例外论，而且不同国家的例外论也有着不尽相同的叙事方式和核心支撑，但每个国家的例外论都对其外交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印度例外论是印度认为自身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信念，其源头是古老辉煌的印度历史以及宗教、民族文化等，核心是以印度的文明道德优势为基础的印度特殊论。例外论界定了印度眼中自身的全球地位，它使印度拥有一种当之无愧的使命感，鼓舞着印度将其“道德行为”推广到国际关系领域。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到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印度例外论深深地影响了印度的大国战略和外交政策。印度例外论包括几个基本信念：一是印度注定伟大；二是印度文明和道德优越的信念；三是印度是一个“桥梁国家”。这些信念在战略文化和心理层面为印度的外交选择提供了正当性来源，使得印度外交呈现说教式的“道义外交”和投机性的“现实主义”的多元路径。

一、例外论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例外论（Exceptionalism），也被译为“例外主义”指国家相信自己拥有与众不同的特性，利用宗教、历史、物质力量、语言、文化和地理来想象和区分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一套思想观念。^②它最初是地理概念，后来演变为地域独特主义观点，即“例外论”观点。例外论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外交领域，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宗教文化、文学作品、新闻传播，甚至大众文化的研究中都会涉及，但是例外论对外交政策影响最为深刻和明显。

^① Nicola Nymalm and Johannes Plagemann, “Comparative Exceptionalism: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1, No. 1, 2019, pp. 12-37.

^② Manasi Pritam, “Examining Exceptionalism in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dia Review*, Vol. 20, No. 3, 2021, p. 295.

（一）概念的界定

例外论的核心在于主张某一国家或某一文明具有本质上的独特性，使其能够摆脱普遍历史规律的约束。早期的例外论研究聚焦美国，后来例外论研究已从单一美国视角扩展至多文明比较，学者们通过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元路径揭示其作为身份政治工具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复杂性。国际关系学者卡莱维·霍尔斯特（Kalevi Holsti）认为例外论的五个基本特征：一是“解放”他人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二是有意愿奉行孤立主义，这种意愿来自对本国凌驾于影响“普通”国家关系的国际义务之上的笃信；三是例外论国家通常认为自己存在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并且倾向于将敌对国家的威胁“普遍化”；四是例外论国家的政府和社会需要拥有外部敌人，因此经常捏造威胁，或者夸大威胁；五是例外论国家将自己描绘成无辜的受害者，他们从来都不是国际不安全的根源，而只是恶势力的目标。他们的行为是对敌对的世界做出反应。^①印度外交部顾问马纳西·普里塔姆（Manasi Pritam）认为例外论是一个额外的变量，有助于理解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他指出国家安全文化取决于一个国家例外论的历史和信仰体系等因素。^②英语单词“exceptionalism”有两重含义：一是“与众不同”（very unusual, unique），二是“无比出色”（outstanding），两者兼具，方称“例外”。^③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国家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与众不同：一是比其他国家更卓越，二是比其他国家更独特。于是有了两种模式的例外论，即一是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二是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④这种区分带来“卓越型例外论”和“独特型例外论”两种分析框架，拓展了例外论的研究路径。不同类型的

① K. J. Holsti: “Exceptionalism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 it Exceptional?”,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 3, 2011, p. 384.

② Manasi Pritam: “Examining Exceptionalism in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dia Review*, Vol. 20, No. 3, p. 299.

③ 李剑鸣：《关于“美国例外论”的历史反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3页。

④ 潘忠岐：《例外论与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性》，《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页。

例外论在外交实践的影响不同，传统的例外论研究并不刻意强调区分“卓越型”与“独特型”，而正是这种区分可以解释为何有些例外论更具扩张性，有些例外论则更具内敛性，而有些国家则可以二者兼具，交替呈现。本文认为例外论即一国对其自身独特性和负有的特殊使命与角色的理解，是一整套涉及对自身宗教信仰、历史经验、国家意志和地缘政治环境的阐述，与文化道德优越感相伴相生，对国家的战略文化、安全观和外交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

（二）既有研究

关于外交政策中例外主义的研究较多以美国和欧洲为研究对象，也见于分析俄罗斯的文章中。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学界也越来越关注“非西方的例外主义”。

大多数关于美国例外论研究阐述了美国人对其与生俱来不同凡响的命运的骄傲感。比如美国历届总统多次引用“山巅之城”一词来表达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和“上帝的选民”“天赋使命观”这几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成为美国人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认定的重要思想源头。美国例外论将美国定义为“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特殊角色的非凡国家；不仅独一无二，而且优于其他国家”。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在美国是一种“持久的身份叙事”，并为政治领导人如何讲述“美国”的故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设定了参数。^①也有学者持批判性观点，马纳西·普里塔姆认为美国的例外论来源于“历史的缺乏”，由此体现出相信本国政治价值观的普世性、相信本国负有天赐的使命、惯于进行他者化（otherizing）的特点。^②

例外论的核心部分离不开“文化优越感”和“特殊使命论”，都强调自己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的使命，而且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和发展历程。当前，国内外很多学者也对非西方国家的

^① Hilde Eliassen Restad, “Whither the ‘City Upon a Hill’? Donald Trump, America First,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Foreign Policy*, Vol. 3, No. 1, 2019, p. 64.

^② Manasi Pritam: “Examining Exceptionalism in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dia Review*, Vol. 20, No. 3, 2021, p. 297.

各种例外论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等“崛起的大国”的例外论。尼克拉·尼玛尔姆（Nicola Nymalm）和约翰内斯·普拉格曼（Johannes Plagemann）认为例外论既不是美国独有，也非新兴大国中的“新”现象，也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单边主义的或豁免主义的。一方面，“例外论”国家通常认为自身在道义上优越于其他国家，其价值与主张是“特殊”的；另一方面，“例外论”国家认为自身代表的价值、政策、模式等具有“普遍”意义，超越国界，是其他国家应该追求的目标和参照的标准。^①

二、印度例外论

印度例外论是一整套关于印度与其他国家在宗教与信仰、政治与社会价值、发展道路及外交战略等各方面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的话语论述，它热衷强调自身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价值所在，将自身描绘为一个能够包容所有文化的模范文明和桥梁。印度例外论因印度热衷强调其拥有“在世界事务中提供道德领导的独特能力”，^②有时候直接被称为道德例外论，印度例外论是印度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印度外交政策和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印度例外论：内涵与核心

历史文化的优越性、注定伟大的宿命感、与众不同的规范性、能成为不同文明之间桥梁的自信构成印度例外论的主要内容。印度例外论思想的源头正是印度本国古老辉煌的历史，一直深刻塑造着印度人对印度国家特性与印度在国际社会中角色的理解。

^① Nicola Nymalm and Johannes Plagemann, “Comparative Exceptionalism: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1, No. 1, 2019, pp. 12-37.

^② Ibid.

印度例外论和其他国家的例外论本质别无二致，其核心也在阐述自身的“与众不同”，但印度例外论扎根于印度各种宗教的教义和哲学思想中。从某种角度来看，印度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其特殊性不仅体现在文化、历史和政治上，更在于其独特的国家发展逻辑和全球定位。它既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一个试图用现代民主框架整合碎片化社会的年轻国家。它辉煌的历史和丰富的多样性使它独一无二，同时印度文化还有着强大的融合能力和同化能力，依靠这样的能力，印度将自身描绘为一个在例外论语境下能够包容所有文化的模范文明。印度例外论将印度构建为一个历史可追溯到吠陀时代的优越文化的国家，这种文化象征着纯洁、团结、共存、繁荣和荣耀，可以说印度例外论沉浸在被其理想化的文化历史中，印度认为他们不应卷入大国的纷争，要通过树立榜样来引导世界。有学者认为印度例外论的核心体现在三个主要原则中：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亲联邦主义（pro-federalism，也被译作强化联邦主义）^①。印度认为正是他们这样一个极度多元化的国家，具备开创多元文化治理新范式的独特优势。印度可以构建这样一种多元文化治理体系：既赋予政府适度调节权，又防范多数群体压迫少数群体。社群主义在印度语境中呈现出独特的思想内涵，成为印度例外论的核心内容。在西方盛行的关于东方社会的主流观念是社群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东方社会以种姓、宗族和家庭为基础，而西方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这种观点经常出现在19世纪的西方学术研究中。然而，印度思想家的政治方案清晰展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共生景观：他们在表达政治诉求时，既恪守本土传统，又显现着现代性的个体理性精神。简言之，道德自我在其政治思想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无论是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还是应对内部斗争，这种道德主体性的建构始终至关重要。^②印度的强化联邦主义则强调他们并非简单照搬西方联邦制，而是基于本土政治实践、兼顾中央权威与地方灵活性的独特治理模式。

^① Bhanu Dhamija, *Indian Exceptionalism : A New Creed for a Greater Bharat*, presidentialsystem, June 29, 2018, <https://presidentialsystem.org/2018/06/29/indian-exceptionalism-a-new-creed-for-a-greater-bharat/>.

^② Kesava Kumar, "Community, Common Good and Democracy: An Indian Response to Western Communitarianism",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2, No. 2, 2009, p. 206.

（二）印度例外论：双重特性与具体信念

印度例外论具有内敛性和扩张性的双重特性。潘忠岐认为一国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与众不同：一是比其他国家更卓越，二是比其他国家更独特。因此，国家例外论存在两种形式：一是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二是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前者会使一国采取扩张型的外交政策，旨在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本国的理念和规范。后者会使一国采取防守型的外交政策，强调国际上通行的理念和规范不适用于本国。^①印度的例外论兼具这两种类型的例外论特征。在印度例外论的叙述中，印度在人类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作用，它不仅是更独特的，而且是更优越的。作为印度例外论源头的印度历史文化母体本身既有代表印度的理想主义的阿育王政治文化，也有代表现实主义政治文化的考底利耶政治文化。不论是在古代还是近代，印度历史上都不乏两种政治文化的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政治文化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②值得一提的是，不管印度例外论呈现哪种形式，印度领袖和精英阶层都能使用印度例外论为印度的外交政策背书。印度的例外论有三个具体的信念：

一是印度注定伟大论。印度例外论的一个重要认知基础和具体表现是印度注定伟大的信念。印度注定伟大的信念深受印度独树一帜的婆罗门等级世界观和印度“中心论”思想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当印度的精英们论述印度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时，他们都有同样的、关于印度在亚洲或世界的“中心地位”意识。^③除了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更影响印度认知的是婆罗门等级世界观。深受婆罗门为首的种姓文化的影响，印度的世界中心观里还带着油然而生的优越感，他们相信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应居于世界

① 潘忠岐：《例外论与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性》，《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页。

② 隋雪濛：《考底利耶、阿育王与印度政治文化的两面性》，澎湃新闻，2021年12月4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692753。

③ 宋德星：《从战略文化视角看印度的大国地位追求》，《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6期，第28页。

等级结构的最高层”^①。印度精英阶层中这种认知尤为强烈，作为极具外交热情的印度开国领袖，婆罗门阶层出生的尼赫鲁曾经说过，印度有“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成为世界大国，^②尼赫鲁在印度独立之初的政治思想是充满国际主义与和平主义色彩的，在尼赫鲁的影响下，印度具有优越感的信念在印度外交部门根深蒂固并不断强化，这种优越感体现在：印度在建立一个道义和公正的世界秩序，在确保全球和平与合作方面可以发挥促进作用。印度人期望世界不仅在政策方面承认他们国家的这一角色，而且在印度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的历史和文明取向方面也承认他们国家的这一角色。^③从开国元勋到现任的莫迪总理，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都强调印度是个注定伟大的国家，世界承认这一点只是时间问题。

二是对印度文明和道德优越论的信念。印度例外论的第二个具体信念是印度拥有无可争议的文明道德卓越性，这种优越感又转化成了一种使命感，鼓励印度将“道德行为”投射到国际领域。印度例外论将印度构建为一个拥有可以追溯到吠陀时代的优越文化的国家，集中体现为印度文化的纯洁、团结、共存、繁荣和荣耀。印度的典籍、史诗和论著，如《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政事论》（*Arthashastra*）、《吠陀经》（*Vedas*）和《奥义书》（*Upanishads*）中对这些做了自豪地描绘。这些历史文本代代相传，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提供了哲学、宇宙学和伦理学方面的知识，并潜移默化影响着其国际事务决策逻辑。神话典故常见于印度政府对民众的外交政策阐释，加之作为印度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发源地的文明底蕴，共同构成了印度精英应对外交挑战时经常拿来引用的多元文明参照系。^④这些文化上的优越感使得印度坚信它在世界历史上的使命是在精神层面上作出贡献。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认为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的姊妹文明是有联系的、互通有无的，

① 宋德星：《从战略文化视角看印度的大国地位追求》，《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6期，第28页。

② Vernon Marston Hewit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South Asia*,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95.

③ Kate Sullivan, “Exceptionalism in Indian Diplomacy: The Origins of India’s Moral Leadership Aspirations”,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37, No. 4, 2014, pp. 640-645.

④ Manasi Pritam, “Examining Exceptionalism in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dia Review*, Vol. 20, No. 3, 2021, p. 306.

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比较优越的。^①曼莫汉·辛格也曾说：“像我们这样的古老文明，是世界上不止一种伟大宗教和许多哲学传统的家园，是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土地；印度位于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在世界上拥有独特的地位是自然且可以理解的。”^②普里亚·查科曾说，印度例外论的概念不仅是证明印度外交政策实践和特定措施合理化的一种手段，而且是根据其文化和殖民历史经验构成的一个有意识的“道德政治项目”，旨在实现其注定的角色，成为全球领先大国。^③

三是印度是“桥梁国家”的信念。印度的例外论叙事将印度描述为具有促进和平、宽容、多样性的团结和克制的高雅文化的典范文明，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④印度丰富的精神遗产可以跨越不同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印度相信自己具有融合不同的观点、聚合不同思想和信仰的能力。曼莫汉·辛格和普拉纳布·慕克吉建议，印度处在不同文明的十字路口，应该充分利用其跨文化谈判技巧，做一个“综合大国”。希夫尚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和亚什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等提出印度作为“另类力量”的概念，他们认为印度在外交政策上与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不同。今天印度“西南方大国”的定位本质上也是在强化其“桥梁国家”的特性。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提出了“西南方大国”的概念，他指出印度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将成为融合西方发达国家特质的“西南方大国”。这一表述体现了印度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独特定位：既保持与西方世界的深度合作，又坚持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认同。^⑤通过“桥梁国家”的定位，印度可以同时扩大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回旋余地。既能够寻求与美国和欧洲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且不会在国内被贴上亲西方的标签，又可以拉近南方国家，塑造“全球南方”国家代表的形象。印度是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同时也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一

①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7页。

② Manmohan Singh, “India and the World: A Blueprint for Partnership and Growth”, MEA India, November 6, 2004,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961/Prime+Minister+Dr+Man>.

③ Priya Chacko,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Identity from 1947 to 2004*,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2011, p. 3.

④ Kate Sullivan, ed., *Competing Visions of India as a Global Power: India's Rise Beyond the Wes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5, pp. 24-31.

⑤ India Today: India would be a south western power, say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Jaishankar,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india-would-be-a-south-western-power-says-external-affairs-minister-jaishankar-1605763-2019-10-03>.

方，印度强调自身是非西方国家而不是反西方国家，印度主张国际关系应该具有“灵活性”，并强调“可变几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重要性，^①这与印度对自己一直是并且也应该长期是一个“桥梁国家”的信念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例外论提供了国家外交政策选择的基本假设和参考框架，印度例外论的宏大叙事虽然不能直接揭示印度的国家意图，但体现了印度对本国国际角色定位的自我认知，可以帮助理解印度各个阶段的外交战略及其生成机制。

三、印度例外论对印度外交的双重影响

如同例外论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印度的例外论也深刻影响着印度的对外政策。在印度的领袖和精英阶层看来，印度外交的真正力量正源于其独特的“例外论”。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印度例外论的表现有所差别。在物质力量较弱时印度外交倾向于防守型的外交政策，偏好通过标榜道义外交寻求国际影响力，展示其以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不结盟政策就是这类例外论的最著名和最典型的代表。当印度经济实力增强，尤其是国际环境处于对印度有利的时机时，印度倾向于强调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表现为强权政治，对大国身份炽热追求，随即转向实施扩张型的外交政策，热衷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印度的理念和规范，当下印度正处于这种情况之下。

国家战略的差异性不仅在于不同国家的目标 and 能力差异，还在于这些国家如何将它们的目的和手段联系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如何看待自己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②印度的例外论是印度看待自身和世界的逻辑原点，是印度制定和推行对外战略的正当性和合

^① Chilamkuri Raja Mohan, “India’s New Alignment: ‘Non-West’ but Not ‘Anti-West’”, *ISAS Briefs*, February 19, 2024, <https://www.isas.nus.edu.sg/papers/indias-new-alignment-non-west-but-not-anti-west/>.

^② Manasi Pritam, “Examining Exceptionalism in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dia Review*, Vol. 20, No. 3, 2021, p. 298.

法性的重要源泉。印度根据自身实力的强弱和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对比来调整自己的外交战略，这是印度外交“变奏”的内在逻辑。

（一）印度例外论的内敛性与道义外交

在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印度例外论强调其独特的内敛性，主张印度具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发展道路，强调国际上通行的理念和规范不适用于本国，希望印度通过宣扬和平与宽容的传统道德规范来实现发展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例外论经常被说成是“道德例外论”，它促使印度外交具有道义偏好，对印度外交的影响可以通过这一时期印度的所思、所说、所做，即观念、辞令、政策来观察。

观念层面的影响表现为印度外交战略中的理想主义情节。首先，这种理想主义体现在印度的婆罗门等级世界观和印度拥有“天定命运”^①的认知上。二者共同构成了印度文明独特的自我认知体系。这种结合既植根于古老的宗教传统，又被现代民族主义所重构，形成了一套解释印度文明特殊性与历史使命的意识形态框架。婆罗门阶层长期主导印度的决策权，在他们的“天定命运”观念下坚信：一是印度应该被视为世界一流大国。婆罗门出身的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写道：“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②二是确信印度注定在全球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不管其实际的物质能力如何。印度的宗教，无论是印度教、佛教，还是耆那教、锡克教，它们在教义和哲学上都具有一种轻视物质、重视精神，轻视外在肉体、重视内在灵魂的倾向。在这些教义的长期教化和熏染下，印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出一种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③这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投放

① 印度教将普罗大众分为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处于四大种姓金字塔顶，也是天然的统治者。印度教等级观投射在国际关系领域就形成了所谓“印度中心说”“印度天命论”“天定命运”，即认为印度注定是“一等大国”，这一地位是印度与生俱来的使命。印度领导人将“天定命运”带入印度的外交政策并产生深远影响。

②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③ 朱明忠：《综论印度文化的特点》，《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1期，第99页。

到国际关系层面的后果就是印度产生了这样一种认知，认为相比物质实力，印度的全球影响力是建立在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精神优越感。三是相信印度教能够代表解决世界问题的优越精神道路，印度是世界导师（vishwaguru）。印度不同时期的文明想象都催生了一种旨在改变全球社会等级秩序的教育使命。莫迪大胆宣称印度能够为世界提供民主典范，这一主张不仅源于他及其意识形态同僚渴望让印度古文明在全球舞台重获荣光，更与其领导层及思想阵营推动印度成为“世界导师”的宏大抱负一脉相承。“世界导师”作为国家对外社会政治工程，既出于教育维度，更蕴含变革性内涵。^①

其次，对印度特殊使命的描述和强调。从尼赫鲁时代开始，印度外交部门就根深蒂固地认为印度在建立一个道德和公正的世界秩序，能够在确保全球和平与合作方面发挥与众不同的作用。理想主义以其崇高的道德目标对内成为民意号召的手段，对外成为印度大国梦的基石。

再次，印度特殊的历史文化，它是印度道义外交的思想源头，也强化了道义外交的理想主义色彩。从印度独立过程来看，国大党对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有纪律的非暴力和大众支持的胜利，在获得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形成了这一种范式，即“依靠观念的力量”，这段历史经历赋予印度一种无与伦比的优越感，认为印度人在参与解决冲突的能力上高人一等，至少在道德上高于那些不断诉诸暴力的人。

外交叙事层面的影响表现为印度外交表述中的道德说教偏好。例外论的叙事语言最终往往呈现为一个国家对其信仰的表述，目的是激发人们对国家注定伟大的希望、勇气和信念。这种例外论的叙事方式在印度外交政策上表现为道德说教偏好。“热爱说教”被认为是印度外交的标签。^②印度外交政策经常呈现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表达，因为相信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质赋予了自身能够兼容所有文化、和平、道德追求的精神力量，具体到外交政策表述中经常出现几近自恋的言辞。牛津大学教授凯特·苏利文（Kate Sullivan）通过考察印度独立前后数十年间形塑其外交体系的话语、身份认同与制度机制，追溯印度外交

^① Kate Sullivan de Estrada, "What is a vishwaguru? Indian civilizational pedagogy as a transformative global imperativ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9, No. 2, 2023, p. 435.

^② Manasi Pritam, "Examining Exceptionalism in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India Review*, Vol. 20, No. 3, 2021, p. 297.

中例外论思想的根源，尤其聚焦印度追求道德领导地位的核心诉求现象，揭示了印度外交官如何通过跨国比较定位国家地位，并构想印度在全球政治中的特殊道德责任。认为道德领导诉求至今仍是印度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①“道义外交”在印度独立（1947年）后那段时间，在总理兼外长尼赫鲁的领导下，表达得最为突出……^②印度的外交以其“道德论调”而闻名，其核心是印度拥有“在世界事务中提供道德领导的独特能力”。^③盟运动的发起、万隆会议上支持新兴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并和中国一起提出“潘查希拉”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积极支持亚非拉国家的独立运动都充满了道义色彩。尼赫鲁对印度重要性的看法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虽然与发达世界国家的物质平等是确保印度未来自由和崛起的唯一手段，但印度特别有能力为科学和技术提供道德指导。^④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印度外交政策的许多早期实施者都内化了一种支撑印度外交政策轨迹的特定世界观的共同元素：对印度道德卓越的信念，以及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道德领导作用的动力。^⑤

最后体现在行为层面，印度的道义外交转化为不结盟与战略自主主张。不结盟是印度例外论转化为具体政策的典型代表。印度认为自己是一个道德上更优越的国家。不结盟的政策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实践，其做法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当时印度拒绝与任何集团结盟以维护其自治。今天的战略自主仍源自这一思想体系。印度外交经常包裹着浓郁的道义色彩，特别是那些以印度为中心的思想赋予了印度道德领导的抱负和开展道义外交的冲动。印度政客及外交官将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了解印度的全球地位，并设想印度在世界政治中的特殊道德责任，在此基础上强化了例外论思想，形成了印度的道义外交。印度在不结盟时期扮演了发展中国家领导者的角色，它反对发达国家的等级制度，作为一个桥梁，它将自己塑造成一种力量，代表着世界秩序中的多元化、多样性和融合性。

① Kate Sullivan, "Exceptionalism in Indian Diplomacy: The Origins of India's Moral Leadership Aspirations",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37, No. 4, 2014, p. 640.

② Ibid.

③ Nicola Nymalm and Johannes Plagemann, "Comparative Exceptionalism: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1, No. 1, 2019, pp. 12-37.

④ Kate Sullivan, "Exceptionalism in Indian Diplomacy: The Origins of India's Moral Leadership Aspirations",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37, No. 4, 2014, p. 644.

⑤ Ibid.

（二）印度的例外论的扩张性与现实主义偏好

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会呈现出例外论的不同倾向，印度例外论另一面是以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与之相匹配的是扩张型的外交政策。印度卓越的发展模式被作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样板，印度应该被视为一种规范性力量，获得世界性领导大国的地位。这种情况下，印度的例外论呈现了扩张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成为其偏好的外交选项，在战略目标界定、战略威胁的认知、战略手段的选择、战略原则的确立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印度例外论的扩张性对印度外交中现实主义的转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首先，现实主义文化本身也是支撑印度例外论的思想基础。印度有古典现实主义的传统思想。西方有研究将印度《政事论》称为最早的现实主义文献，有研究甚至将考底利耶（Kautilya 或 Chanakya）称为第一位现实主义者，^①当代学者称《政事论》为最早用历史实证方法阐述国家和均势理论的梵文经典，考底利耶也由此被视为“第一个系统叙述国际关系”的人。^②《政事论》表示，和平与战争都不是国家追求的目标，权力和成就才是国家追求的目标，只要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战争或和平都是可取的，并无天然的优劣之分。《政事论》提出了“曼荼罗”体系，被认为是印度版的均势思想。曼荼罗体系中各国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邻国都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③。考底利耶思想是印度例外论的历史文化源头，也是当今印度外交战略和安全理念的重要思想源头之一。另外，再回到前文提到的“天定命运”，在外交辞令上，印度对其进行了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阐释，印度把自己描绘成平等权利的捍卫者，但是在具体行动上，“天定命运说”为印度在南亚推行扩张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其次，印度民族主义者对印度例外论有着更大的野心。例外论和

① 曾祥裕、魏楚雄：《〈政事论〉国际政治思想研究》，时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49 页。

②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 页。

③ 曾祥裕、魏楚雄：《〈政事论〉国际政治思想研究》，时事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0 页。

民族主义虽然是截然不同的概念，但两者又有极强的关联，例外论倾向于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卓越的民族特性。印度教民族主义认为印度绝对等同于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推动印度外交成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拥趸。在国际事务中，极端民族主义者持一种类似“霍布斯结构”的世界观，认为国家都是自私逐利的，国际竞争是零和博弈，修昔底德式的弱肉强食观念对其战略思想影响十分明显。^①在印度，极端民族主义者们遵循考底利耶“曼荼罗”地缘政治考量，主张“印度第一”，认为印度可以利用全球矛盾创造的机会实现印度的崛起，毫不犹豫地根据自身利益调整立场。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战略关切也左右着印度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主张印度崛起首先依靠“自力更生”，但又主张在有明显政治和经济收益的情况下参与战略伙伴关系。^②莫迪执政十多年以来，印度民族主义影响不断强化，印度官方到学界展开了很多对《政事论》与当前世界政治的讨论和研究。辨喜国际基金会负责人阿尔文德·古普塔（Arvind Gupta）在2019年指出，《政事论》是古印度战略思想宝藏，印度年轻学者要重视对这部治国理政经典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当代地缘政治现实的新《政事论》。^③

再次，现实主义思想基础和印度民族主义者共同产生作用，在特定国际环境中催化了印度例外论的扩张性。如果说现实主义思想基础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野心是印度例外论呈现扩张性的内在动力，那么国际形势的变化、印度对其面临外部威胁的判断则是其转变的外部因素。现实主义思想基础和印度民族主义者的野心作为内因提供了精神层面的支撑，而近年来印度不断增强的物质力量也让印度感到转型的可行性。作为持续崛起的新兴经济体，印度连续多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综合实力已跻身全球前列，在内因与外因、精神驱动与物质支撑共同作用的情况下，印度的大国地位诉求、主要手段以及秩序观都发生了变化。印度转向了以强调本国更卓越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时，印度的外交偏好也转向扩张型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中美冲突加剧和美印关系升级为印度迎来其所谓国际“战略机遇期”，加强了印度

① 王文佳、汪伟民：《印度战略界对华策略论争研究》，《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第29页。

② 同上。

③ Arvind Gup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autilya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University of Delhi, March 17, 2019", *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March 19, 2019, <https://www.vifindia.org/directorremarks/2019/march/20/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kautilya-and-the-contemporary-world>.

外交的扩张性倾向。印度在此阶段一方面急于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本国的理念和规范，继续谋求其“卓越”的大国地位，一方面急于强调外部敌人和其面临的威胁，具体来说，即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为其扩张倾向提供合理性。印度背离不结盟，投身“印太战略”，成为美国的准盟友，将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投机面貌展现无遗。在例外论不同的面貌之间，印度灵活切换道义外交与权力政治，实现了本国现实利益的“最大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此消彼长促成了其外交战略的变奏。

四、例外论视角下的印度不结盟战略

有学者指出今天人们对不结盟运动缺乏兴趣，表明不结盟运动作为全球政治中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正在更大程度上消亡。印度的案例是这一全球转变的最佳典范。^①印度对不结盟战略的坚持与背离，体现了印度例外论的转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两种例外论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一个光谱的两端，尽管取向不同，但却是不可分割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可能会呈现出例外论的两种不同倾向。^②印度对不结盟战略的坚持与背离和印度例外论同时具有内敛性和扩张性的双重特性有关，印度根据自身实力变化、对外部威胁的感知切换了其例外论的表现形式。

例外论对印度外交的影响，在印度独立初期表现为不结盟和反殖民立场。不结盟优先主义强调印度古老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包容性，认为印度是支持结束殖民主义和寻求世界和平的国际理想的道德声音，其合法性来源是其“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普世道德”。^③在印度人眼中，东、西方两大阵营都在表现为无情的强权政治，而印度的不结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① Harsh V. Pant: “The End of Non-Alignment?”, *Orbis*, Vol. 61, No. 4, 2017, pp. 527-540.

② 潘忠岐：《例外论与中美战略思维的差异性》，《美国研究》，2017年第2期，第11页。

③ Teresita C. Schaffer and Howard B. Schaffer, *India at the Global High Table*,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6, pp. 65-69.

（一）例外论视角下的不结盟

美国的例外论也有两面性，体现在“孤立主义”与“全球主义”两大战略思想的交替上。美国的例外论也有不同的派别，模范派把美国看作是“模范国家”，反映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山巅之城”“不结盟”“反帝国主义”“孤立主义”“美国堡垒”。“模范派”强调美国不要卷入世界的纷争，要通过树立榜样来引导他们。^①例如，杰斐逊就曾经提出美国不要陷入纠缠不清的结盟中去，所以不结盟并非印度所独有，即便是美国，在它羽翼未丰、无力与其他大国抗衡的时候它也是强调不结盟的。同样，独立初期的印度内忧外患、国力孱弱，也倾向于彰显以强调印度比其他国家更独特为基础的例外论，展示其外交的内敛性，把道义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选项。不结盟政策形式上正表现为理想主义色彩包裹下的道义外交。对内，印度坚持世俗主义，对不同群体和宗教的价值体系持包容态度，以世俗主义保障了民众的价值选择自由。对外，印度以不结盟政策为保障，不在大国间选边站队，尊重各国的制度选择。内外呼应展现了印度的和平形象，同时占据了国际社会的道德高地。不结盟的道义色彩作为印度外交理念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和认可是印度软实力的体现，弥补了物质力量的不足。不结盟不是简单的中立主义，它同样是建立在对印度地缘政治形势的现实利益评估上的。这一阶段的印度大国意识和现代意识都是指向其文明的优越性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不结盟是其防守型外交政策的表现，但这其中仍然隐含着充当亚洲领袖和实现大国地位的追求。

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是第一个采取不结盟政策的国家，不结盟战略是印度强调独立自主、不在大国对抗中选边站队以及军事中立的一项战略，一度成为印度外交政策的代名词。在不结盟主张下，印度把发展国家经济、维护外交独立性、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世界和平作为优先事项。印度独立初期的领导人坚信，只有远离权力集团，拥有外交决策的自由，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印度

^① 韩晓霞：《浅析例外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7年第8期，第142页。

的不结盟战略以印度例外论的道义外交为逻辑底色。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意味着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歧视和新殖民主义，同时印度的不结盟拒绝超级大国优越的概念，它主张所有国家主权平等。不结盟鼓励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反对将世界分裂为国家集团的联盟，不结盟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拒绝使用武力。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应该能够在国际上保留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不结盟没有固定的定义，这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家和政府对这个词的解释不同，并且在不同的背景下也有所不同。^①这也使得印度的不结盟战略本身就有不同的选项。

（二）印度对不结盟的坚持与背离

不结盟政策曾使独立初期的印度深受其益，维护了印度的国家独立，提高了国家声誉，增强了印度的国际影响力，但印度外交从不囿于不结盟政策，印度的不结盟是相对的、局部的和有选择的。印度是根据国家利益需要灵活选择结盟或不结盟，即便是在印度高举不结盟大旗的冷战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度与苏联仍结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②对于印度偏离不结盟的原因，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分析。从例外论的视角考察印度不结盟战略，印度在自身实力相对弱小、国际形势相对平稳，选择强调本国更独特为立论基础的例外论，这时候印度的例外论呈现内敛特点，偏好实行防守型的外交政策；在自身实力相对增强、国际冲突加剧，印度的例外论则呈现扩张性，偏好扩张型的外交政策。基于对印度例外论两重性的认识，不结盟政策的“立”与“弃”交替，是印度根据实际需要和外部环境作出的选择。

印度独立初期以及20世纪50年代是印度不结盟政策的高峰期。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的面积、地理战略位置，加上各大国不愿意看到印度再次受到外国统治等因素，将使印度免于遭受任何大规模的外来进攻。”大国间的竞争是印度免于遭受进攻的最有效保证。印度独立后到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前，尼赫鲁对于印度的外来威胁一

^① Upadhyaya and Priyankar, *Non-aligned States and India's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New Delhi: South Asian Publishers, 1990.

^② 李莉：《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第1—35页。

直保持着这种唯理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①

印度第一次背离不结盟发生在 1962 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前后。1962 年印度的外来威胁感知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使得印度背离了不结盟政策。不结盟政策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接受任何外来军事援助,但印度一方面和苏联加强了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还公开向美国乞求军事援助。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前,苏联承诺向印度提供米格-21 战斗机,这是苏印建立军事关系的标志性事件。^②中印双方交火过程中,尼赫鲁直言不讳地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干预,要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同中国部队作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其著作《印度对华战争》中记录了这段历史,书中指出“尼赫鲁认为印度正开始同中国进行一场长期的虽然是不宣而战的战争,这就使尼赫鲁完全放弃了过去拒绝寻求军火援助的建议”“当美国大使拜会尼赫鲁,并表示愿向印度提供它所需要的军事装备时,他立即表示接受”。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也记录当时《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印度长期以来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现在又接受了美国军事援助,它表明尼赫鲁政府不结盟政策的外衣已最后脱落了。……尼赫鲁越是反华,就越要投靠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尼赫鲁一步步丢掉不结盟政策,正是他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坚持反华的必然结果。^③

印度第二个对不结盟发生明显背离的时期是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1972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苏对抗升级的背景下印度再次强化了它的外部威胁认知,继续发展与苏联的盟友关系,形成了印苏对峙中巴美的格局。其间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 1971 年,印苏签署了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这也是印度背离不结盟的标志性事件,原本承诺不选边站队,不与美苏任何一方结盟,但印度却背离了不结盟的初衷。印度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领导国,一直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和外国军队在任何国家驻留,但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站在了苏联的一边。印苏结盟影响也是深远的,它影响了印度和整个南亚国家的关系,导致在 20

①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 1971 年版,第 287 页。

② P. R. Chari, “Ind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 A Review”, *Asian Survey*, Vol. 19, No. 3, 1979, p. 232.

③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 1971 年版,第 424 页。

世纪 80 年代西方国家集体制裁印度，南亚成为冷战的对峙前沿。

印度的不结盟政策最微妙与复杂的变化发生在 2010 年以后。1988 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正常化“脱钩”，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正常。20 世纪 90 年代，中印边界总体保持平静。1998 年印度核试验后中印关系短暂蒙上阴影但是很快过去，从冷战结束后到 21 世纪的前十年，印度重拾例外论的内敛性，再次回归了不结盟政策。印度再次强调任何军事同盟都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印度重新主张战略自主，力图在均势体系下与各大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①但是随着美国对印政策的重大调整，印度逐渐再次背离了不结盟，与前两次背离不结盟情形不同的是，这次印度对不结盟的背离是个渐进的过程，表现得更为微妙和复杂。印美关系靠近从 2001 年始见端倪，2001 年美国主动解除对印度制裁，此后印美关系快速升温，2012 年印度战略界出台著名报告《不结盟 2.0：21 世纪印度的外交与战略政策》，对印度“不结盟”原则进行了反思和再定义，以此为标志，印度政府已经着手积极酝酿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调整。2014 年莫迪上台后印度对外政策整体发生重大改变。莫迪被认为一直试图将自己与印度主要反对党国大党的理想主义前任尼赫鲁区分开来，他将自己塑造成外交政策实用主义者，远离了不结盟运动。印度前外交部长维贾伊·戈卡莱（Vijay Gokhale）在 2019 年雷西娜对话期间宣称，“印度已经摆脱了不结盟的过去。今天的印度是一个结盟国家。”^②2015 年印度战略家拉贾·莫汉（Chilamkuri Raja Mohan）高调宣传“不结盟已被彻底埋葬”^③。2016 年和 2019 年莫迪连续缺席两届不结盟运动峰会，被认为拉开了“后不结盟时代”的序幕。2020 年美印两国宣布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标志着印度正式成为美国的“准

① 2000 年，印度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4 年，印度与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5 年，印度与中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 年，印度与日本建立“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印度与美国在 2001 年提出“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04 年实施“战略伙伴关系后续步骤”，2005 年提出致力于建立“全球伙伴关系”。

② Shairee Malhotra, “Is Non-Alignment Back in Fashion in Modi’s India?”, *Fair Observer*, June 5, 2020, https://www.fairobserver.com/region/central_south_asia/is-non-alignment-back-in-fashion-in-modis-india/.

③ Chilamkuri Raja Mohan, “Raja-Mandala: The Final Burial of Non-alignment”, *The Indian Express*, November 17, 2015,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raja-mandala-the-final-burial-of-non-alignment/>.

盟友”。印度不仅与美国形成了“准盟友”，还加入了具有“同盟化”特征的美日印澳四国合作机制。与前两次背离不结盟不同的是，除了外部威胁感知的强化，印度当下还感受到了成为世界大国的机遇。中美博弈的加剧以及中美博弈期将继续持续的预判让印度感受到了自己处在一个战略机遇期。在当前全球秩序动荡、国际合作减少的背景下，印度看到了塑造新兴世界秩序的机会，希望印度全球性大国的地位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身份得到认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印度的扩张性一方面是对中印紧张关系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实力增长以及对全球格局变化中自身地位变化的新预期共同作用形成的，是时候展示一个因“卓越”而“例外”的印度了。

五、结语

印度例外论思想实质是为实现印度的国家利益、实现大国地位提供正当性，例外论思想在印度根深蒂固，成为印度国家身份的核心要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印度的对外行为和外交决策。印度例外论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织，与植根于印度文化中的功利与道义双重目标是紧密相连的。道义外交与权力政治的战略目标内在是一致的，彼此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作为实现印度国家利益的工具和手段，在印度外交政策中形成对立统一。

当前印度的领袖和精英阶层仍然强调印度例外论可以改变历史的道路。但是也指出“如果我们想让巴拉特成为一个真正杰出的国家，我们就必须努力制定一个实用且优越的新政治信条”。^①莫迪政府过去十年被认为在使用“更现实的现实主义”挑战尼赫鲁的政治遗产，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话语中同样善于经营印度辉煌的文明历史和传统，对印度道义外交和理想主义的表述比往届政府都更加频繁。莫迪

^① Bhanu Dhamija, “Indian Exceptionalism : A New Creed for a Greater Bharat, Presidential System”, June 29, 2018, <https://presidentssystem.org/2018/06/29/indian-exceptionalism-a-new-creed-for-a-greater-bharat/>.

经常使用“Vishwaguru”“Vasudhaiva Kutumbakam”（整个世界是一个家庭）、“民主之母”等比喻，将印度奉为一个多元化、包容、和平、民主的文明国家，凭借其卓越品质引领世界。莫迪已经开启其第三个任期，他要带领印度成为全球领导者、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头羊，这不仅需要充满理想情怀且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更需要能对国际体系起决定性影响的物质力量。基于这一目标，莫迪似乎需要在两种例外论文化中找到中间道路。不管怎么样，例外论思想都将继续贯通于印度外交中，成为印度外交的内在逻辑和支撑力量。

[责任编辑：孙喜勤]